

# 明清鼎革与边陲士子的出处

——以谢良琦为例

胡小安

(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6)

**摘要:** 以明清鼎革之际的桂林全州士子谢良琦为例, 考察了边陲士子在时代变局中的出处行为和对待新朝、旧朝的感情态度。由于作为边疆地区的广西桂林曾经处于南明政权的核心地带, 使当地士子得以大量任职朝廷, 并由此切实感受到南明政权党争的严酷; 也由于处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士子有更多的生活压力, 从而于公于私都有寄希望于新朝的想法, 并不抗拒出仕, 但是鉴于传统教育、任职经历、社会舆论等时代环境的压力, 使得这批人存在内心的不安。

**关键词:** 边疆地区; 广西; 明清易代; 遗民; 谢良琦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21) 04-0104-06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1.04.017

## The Alternation from the Ming to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sponse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Frontier Regions: Taking Xie Liangqi as an Example

HU Xiao'an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Guangxi, China 530006)

**Abstract:** Taking Xie Liangqi, the scholar in Quanzhou county of Guilin province during the alternation from the Ming to the Qing Dynasties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origins and behaviors of these scholars in the changing times and their emotional attitudes towards the new and old dynasties. As a frontier city, Guilin of Guangxi province was once in the core area of the Nanming regime, which allowed local scholars to serve in the court in large numbers, and thus they truly felt the harshness of the Nanming regime's party struggles. Meanwhile, due to more life pressure for the scholars in the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areas, they did not resist being officials with new hopes for the new government in public and in private. However, these scholars were innerly anxious with the pressure from the era such as traditional education, official careers and public opinions.

**Key words:** frontier regions; Guangxi province; the alternation from the Ming to the Qing Dynasties; adherents; Xie Liangqi

考察明清易代之际的士人心态和行为, 不仅可以观察传统士绅和政权鼎革之际遗民的情况, 还牵涉到认识明朝何以崩溃、清朝何以一统、明清历史延续性等问题, 这一直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相关研究成果已经非常多, 例如: 赵园教授对明清之际

士大夫和遗民行为和心态的研究,<sup>[1]</sup>汪学群教授对明代遗民思想的研究,<sup>[2]</sup>等等。但是对明清之际边陲地带士子的考察还比较少。本文以广西桂林府全州的谢良琦为例, 进一步认识桂林读书人在明清之际的复杂心态, 以推进对明清之际边疆社会的认

收稿日期: 2021-05-17

基金项目: 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以来湘桂黔毗邻地区的族群建构与国家认同研究”(17BMZ024); 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西民族大学中国南方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桂教科研〔2019〕17号)。

作者简介: 胡小安(1973—), 男, 湖南城步人, 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岭南与西南地区民族历史文化研究。

识。关于谢良琦的研究，梧金丽已有专文，<sup>[3]</sup>但其内容主要是探讨谢氏的文学交游和文学成就，并说明清初文人文学流派以及岭西文学发展的脉络，与本文问题意识完全不同。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增加边疆的个案，以进一步认识明清之际遗民心态和行动问题。

### 一、全州科举底蕴与谢良琦家世

谢良琦，字仲韩，一字献庵，号石臞。其出身于广西桂林府全州读书和官宦世家，父日升，万历十三年（1587年）举人，知福建南平县，擢福州同知；兄良瑾，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任苏州府长洲知县。良琦崇祯十五年（1642年）举于乡，年甫十九。未及会试，遭世变，遂家居，与亲友慷慨谈文论世。顺治五年（1648年）随清军北上，六年（1649年）出为淳安令，<sup>①</sup>未几丁内艰归里；十二年（1655年）为蠡县令，迁常州通判。后署宜兴，又摄沙县。被宜兴绅士诬告，遂被弹劾，废居兰陵，终日以酒浇愁，酒醉即狂歌漫骂发胸中不平之气。久之再起为延平通判，以触权贵得罪，被诬下狱。出狱后寓居延平，艰难度日。康熙十年（1671年）卒，年四十有八。光绪年间临桂词人王鹏运称他“孤直不容于时，再起再蹶。其学以卫道行己、不欺其志为归”<sup>[4]16</sup>，评语堪称切实。

全州是桂林府士绅人数与势力最为可观的地方之一，科举素列前茅。<sup>[5]221-248</sup>嘉庆《全州志》也称：“自汉迄今，率重科目，间由他途，亦百一耳。然名臣循吏、文苑儒林炳蔚相望，而全郡尤为楚粤冠。”<sup>[6]</sup>此地有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在明清易代战争中又始终处于前线，所以，该地士人多豪放救世之气。谢良琦后来回忆其青年时代云：

壬午（崇祯十五年1642）发榜，吾州售者二十五人。灌邑统于州，售者三人，共二十

八人。岭西俗重义气，又是时天下方乱，念非同心友莫以济，于是又集同志十二人，誓于神，乞言于温陵黄夫子澹叟，如古所称生死交焉：马子伯龙、文子际盛，蒋子兆生，邓子而兰，黄子又勿，张子龙如，李子予一，张子仲振，戴子瞻五，灌邑独朱子怀德，家桂林，其先中都人也……追忆乡时取高第，交游然诺，饮酒欢呼，指挥天地，直可唾手。曾未十年，海水群飞，贤人君子憔悴零落如此，可哀也哉！<sup>[4]240-241</sup>

这一回忆描写了明清鼎革之中全州士子结社欲求救世的大概情形。明末士子求友结社乃是一时风气，而短短十年，随着南明败局已成，其匡扶明室的愿望落空，甚至不少人在这场变乱中已经丧生。而活着的人已经处于结社不自由时代，思想行为亦可能发生大分化；且其时他已多经官场沉浮磨难之后，对世态炎凉有进一步感悟：“近世朋友道丧尽矣！仆在宦途所相识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艺取，或平生亲故……在毗陵半年，在江宁一年有余，摧伤之余，稍慰岑寂，足下曾更见有一人来相问讯者哉？”<sup>[4]130</sup>抚今追昔，所以感慨万千。

明清鼎革之际的广西，长时间处于清和南明政权对峙的前线，而桂林府全州有处于湘桂交界地，更在前线之前端。从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余部曾一度到达此地、造成震动开始，至十七年（1644年）正月崇祯皇帝死国，南明几个政权走马灯似的更替，到明宗室桂王朱由榔于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在广东肇庆建立永历政权，一路奔广州、肇庆、梧州、平乐，最后于1647年冬到达桂林。南明永历小朝廷名义上在桂林驻扎了近四年，其中经历了靖江王欲问鼎皇位的闹剧，以及收复广西、湖南、广东之大喜，旋即再次失去该数省之大悲。这给桂林士子带来天翻地覆般的震动。

①《醉白堂诗文集》文集卷1《许哉庵诗序》（第19-20页）：“往乙酉岁，哉庵许使君自沔令移刺吾郡。是时天下已大乱，独吾郡僻处西边，民尚恬耕凿。使君公余顾独喜论诗及古文辞。余得载酒时相过从。后二年，闽广相继沦陷，吾郡乱。使君去吾郡为谏官。时余兄季琳与使君同垣，衡宇相望。余又得载酒时时相过从，论诗及古文辞。又一年，余遇王师于国门，与俱北。”从此推知他投清是顺治五年（1648年）。另在卷3《醉白堂记》中说：“吾年十二而孤，又七年而举于乡，又七年而仕于越。”而同书卷4《邓子瑞哀辞》知谢在崇祯壬午（15年）中举，则应该是顺治六年己丑仕越。《醉白堂诗文集》点校本序第17页载吕集义《谢石臞先生传》言谢顺治八年为淳安令，显误。

## 二、鼎革之际的出处和焦虑

最初,南明朝廷驻扎桂林,一时精英麇集,桂林被目为“稷下”。大量桂林士子也被吸纳到朝廷之中,这也是桂林士子最接近明朝廷的一次。<sup>[7]222-223</sup>但是南明永历政权尤其各武将骄横跋扈、闻敌而逃的表现,以及最后全州守将以城降的结局,给支持南明的士人打击非常大。所以,全州士人愤世嫉俗的情绪以及在乱世中求生存、求明君的愿望都相当强烈。谢良琦记其兄良瑾(奉常公)事迹云:

奉常公既避世,慨然于世道、人心之不合,其所为不合于道。推原丧乱所由,始失声痛哭;又亲在班联,见谐臣、媚子、骄兵、悍弁,并及士大夫依阿苟且之习,感愤毗裂,无可告语,则尽举其读书所得,力折衷反覆而笔之于书。呜呼,人生不幸当乱世,至于国亡家破,其于伤心流涕之际,固有心可得而悲,口可得而言,手必不可得而书……故奉常公之书题曰《未刻者》,示不敢也。其曰未者,又欲遗之余者,犹望其传之也。昔郑所南(郑思肖,南宋遗民——引者注)作《心史》,以锡为函投井中,其后数百年始出。余观其书,义例丛杂,乖戾不可读。后之学者犹取其心,从而宝惜之,况如斯人者乎?今之书,有《离骚》之怨,而不能忘其君;抱《采薇》之节,而不敢非其世。止是眷怀故国、伤心化离,叹息痛恨于贤人君子谋人之国、食人之命、败人之事,使天下读之,知家国虽亡,其草泽之士固有感时念乱、悲吟愁叹而不可禁者,虽无益于事,其志亦足悲也。<sup>[4]16-17</sup>

这种情绪其实同样扎根在谢良琦身上。他在顺治十二至十三年(1657—1658年)间做常州通判或署苏州府宜兴县时,过长江,作《渡江吟·吊史道邻大司马》一诗,集中流露这种悲愤情绪云:

渡江南,望江北,日月黯然无颜色。江南风正寒,酒酣拔剑歌路难。我闻史公天下贤,少年射策红云边。霜雪东南寒豸斧,旌旗江海净狼烟。阍危国运当阳九,天府神京俱不守。玉龙提携相撑扶,辛危难忘主恩厚。誓心淮海一孤城,刁斗无惊夜月明。匹马沙场魂不

返,至今鼓角悲江声。江南帝子无朝昏,斗鸡走狗承新恩。封事披鳞数十上,九关虎豹当君门。复有雄豪专峻外,白玉黄金横作带。寂寞征夫塞上情,萧条妇子秋原泪。朝野内外皆沉沦,吁嗟史公惟一身。安能上慰天子,下安黎民?<sup>[4]293-294</sup>

诗中对史可法在内外艰危之时独撑大局极表敬佩,也对当时文恬武骄的局面深感悲愤,他此时也许会想起数年前在他家乡的永历政权的同样情形罢。

不过,他虽然也主张殉节,“受命于君,有死无二,臣之职也;爱其身不死以辱其身,君子所不为也”,但更认为“士不幸生乱世,全身远害,上也”<sup>[4]156-157</sup>,先保住生命,然后才可以守护自己的理想。所以他曾经劝自己的好友“以为处乱世当静默,不宜比匪人”<sup>[4]240-241</sup>。他的这种想法与当时反清志士王思任所说“可以死,可以无死,英雄豪杰自知之也。英雄豪杰一死不足了其事,则可以无死;其事已了而死至,则可以死……使必以一死为贵,则死而死矣,何济人世事”<sup>[8]</sup>,颇有不谋而合之处。

谢良琦不主张死的理由是认为活着也可以坚持“道”并实践“道”,更重要的是可以匡正社会风气:“然则仆之心盖将试其所学,以行其道,不在禄位之尊卑大小也。然仆遂以此被论议,遭屈辱。呜呼,是岂无故而然哉?天下方务为苟且,仆以其实;天下方务为逢迎,仆以其真;天下方务为诡遇,仆以其拙……仆倘于此时得一官自守其道,更以乡之实与真与拙者,从事于其间,或者亦仆得志之秋乎?”<sup>[4]123</sup>并以自己家族的经历说明坚守耕读传统、安贫乐道的重要性:

独吾族居于粤之鄙,自隆万以来,族之父兄子弟,每春秋家庙祭祀方毕,必相与酌酒告于先灵,谆谆动色相戒。只是服先畴、食旧德,无敢逸豫。故自三四十年来,天祸人,国变乱,相仍饥寒,流离奔窜。即乡举之典亦十五年未行,四民转徙失业,而吾族之人宝其诗书陇亩,与其父兄之训,从无有饰伪猎名、奔走权利捷径、求富贵利达者。其文章虽质朴无惊采可观,而亦不为其雷同剿袭。呜呼,此吾族之所盛也欤?……然自今观之,世之所竟

逐如彼，粤之所守如此，即粤之所守不必尽如此，吾族之所守已如此，其与世之不狭隘、能通晓时事者，孰得孰失？故吾之为是言，不独以告族人，而以告粤人焉；不独告粤人，而以告天下人焉。知吾族之所为得失，即天下之所以治乱也。<sup>[4]123</sup>

可以说，类似谢良琦这种“半遗民”，<sup>[9]</sup>虽有亡国之痛、故人之思，却在耕读传统上找到了清代对明代或者说传统文化的正统延续，所以服务于新朝完全是可行的。顺治十三年（1656年）他汇编家族科举朱卷，并作序云：

顺治十二年乙未冬，奉常公（良琦兄）之子孝廉亦出应童子试。州守今建宁太守滨州鹿园孙公所命题同，亦拔孝廉第一。已而府试、道试亦皆第一。方是时，奉常公所刻《试草》已散失零落久矣。吾令人于旧州守姑苏涑庵马公所求得之，乃合刻焉……然自壬申迄乙未二十四年，中经大丧，不独山川、云物、城郭、宫室、人民、礼乐、车马、衣裳荡然非复畴昔，而文体亦数变易。始甲戌（崇祯七年）及丁丑（崇祯十年），温雅和乐秀整，放而为庚辰之博大奇丽，至于癸未（崇祯十六年）则立干诘繁，菁华稍竭矣。皇清初兴，皇皇文教武功，于文体未暇厘正。及乎乙未，始复旧观。考之奉常、孝廉实若相始终焉。今读其文，迨一人一手之所为，若不知有陵谷变迁，岁月冰霜风雨之流易者，是则可以异者也。<sup>[4]41-42</sup>

再加上顺治朝连续对崇祯年间明臣死国难者、死寇难者、死阉党祸者作出建庙祭祀决定，谢良琦又在其中找到了对忠孝义的继承延续，他有感曰：

世祖章皇帝御极之八年，躬揽庶政，四方万国悉臣服、就法度。念国家就贤体远，必以培养忠义为本。明时寇薄都城，君死社稷，一时殉难诸臣麟麟炳炳。今虽易世，而表彰未及、祭谥不加，甚非古先圣王所以教忠之义，遂令部院诸臣集议以闻。既奏，上悉从礼臣

请，赐谥爵赏有差，又令立庙京师，岁时享祭。臣尝博观载籍，忠臣义士以身殉国多有，未有如诸臣遭逢异代圣神文武之主，显荣尊宠，光被泉壤者也。（中略，言南明门户之争严重，而清廷则不同；而且吊民伐罪，替崇祯发丧举孝，给死难者告慰）逮后江淮、闽越尽入版图，武臣文吏卖降恐后。世祖皇帝豁达大度，亦或录其一节，礼而用之。其人遂自视以为得计，志骄气溢，而圣意渊微，乃独褒美诸臣，昭示天下后世，使举世之人晓然知朝廷所重在此不在彼，然后人知诸臣志节诚足嘉尚，而其不能者亦或感愧以泣也。<sup>[4]151-152</sup>

所以，他同时写《死事五人传》记瞿式耜、张同敞、焦琏、孟泰等死故国国难者<sup>[4]200-203</sup>，著《邓子瑞哀辞》以记乱世之中的孝义者，虽有怀旧之叹，却也是他顺应政治风向抒发内心一贯主张的做法。在当时桂林地区，虽然也有不愿入仕新朝的士人，但一般能允许其子弟参加，<sup>①</sup>总的说来，态度是较开放的，也即赵园所指出的“遗民不世袭”问题<sup>[1]381-384</sup>，毕竟传统社会给予读书人的出路太狭窄了，尤其因桂林经济并不发达，一般士人不出仕则很难解决生计问题。而且，明末当政者的腐朽，军与官的内斗霸道行为给桂林人的负面刺激大了，迫使士子无论从公从私都希望找到新的统治者。

他努力在出仕中寻找济世安民的乐趣和成就感，其《琢句亭记》云：

嗟乎！君子之仕也固亦有幸不幸哉。独余所处之时不然……而余也又以其清静宁一之治以治之，故常安然无事。及乎安然无事，而后得优游燕闲于斯亭之上，则又思昔之名人贤士所为无文字可传者，或者会其时之不幸，而余幸与斯民共乐其太平歌舞之乐，而因以自乐其乐也……夫乐其乐以与民同者，亦吏之职也。<sup>[4]172</sup>

不过，他终究脱离不了那个时代的遗民无法回避的共同问题，即是否应该出仕清朝。他自己说：

①比如《醉白堂诗文集》文集卷1《家侄恒淑孝廉五十寿序》（第75-76页）记道：“及宗国覆亡，迁徙奔窜，时时登高山大原，啸歌痛哭。今其品行定矣……吾闻恒叔家居时，当事欲以应山林隐逸之选者，恒叔辞之坚，虽强之不听。弟素臣，以庚子（顺治十七年）举乡试，能振拔。”

“琦，清臣也，而生于明。”<sup>[4]159</sup>明确表明自己对清朝的归顺态度。然而，他曾经拜访了若干有名的遗民，其《桃源草堂记》云：“余行天下，于秣陵之高座寺识方密之，于西泠之西溪识姜如须，于匡庐之五老峰识郭天门，则高座、西溪、五老峰皆桃源也，贤者之所居也。”<sup>[4]168</sup>文中所及之方密之即方以智，姜如须即姜垓，郭天门即郭都贤，皆为明末高官而不愿出仕清朝的隐居者。不知他们相见都谈了什么，但是肯定会感慨天下兴亡，也许会谈到是否要出仕新朝。他称这些人为“贤者”，显然从其内心还是赞同不仕新朝的。这正是谢氏一生的矛盾之处。

根据谢良琦自述，他投入清政权大约是顺治五年（1648年），说“余遇王师于国门，与俱北”，似乎是主动投入清军，又似乎是受到清军的胁迫而去的。<sup>①</sup>他的行为后来似乎同样受到友人的责难，他在《与贾二安书》中说：“仆始十九时，受知尊大父徙南夫子。此时天下方乱，私念非圣贤固不能以济，遂欲焚弃帖括，驰骛于救时之略。属国家遭李逆之变，南北梗塞，因得究穷于经传、子史、百家之业，博观古今成败兴亡得失之数，与贤人君子所以斡旋匡济之方，以为幸而见用，则犹将为之，不然守其道终老则亦已矣。遭际圣朝，两仕为令。当时所设施虽非二安所亲见，然二安视仆有意蓄货财、美衣食，以取悦儿女子者乎？岂有意矜权势、市恩泽，使交游亲戚叹其伙颐者乎？”<sup>[4]123</sup>他极力辩驳别人以为他想升官发财的观点，表白自己的理想。

他另外写的两篇文章《五大夫说》和《五大夫辨》也很有意思，借被秦始皇封为“五大夫”的松树之隐喻，表达了他的心路历程。该文写作时间不详，可能其是回答友人责难时有感而写，也有可能是遭诬下狱后所写。其中，寓言故事《五大夫说》曰：

（始皇令以松为五大夫）诏至，一时荒丘僻壤，梗、楠、杞、梓、榆、柳、枫、漆之属，有叹息者，有庆幸者……维时松默然不语，移时，既而流涕曰：“嗟乎！夫宁知是虬然者之为吾齿角也哉！吾闻秦法暴，不拜惧不

免。虽然，吾义不辱，吾姑受其官而辞其爵与禄焉。二三子视吾被章服犹泣也。”遂奉诏居。久之，客有谈武陵桃源事者，大夫愀然不乐，怅然沮丧其志气曰：“吾向以华也实而不坚，故羞与同列。今其寄托，何啻什伯于吾。纵彼不言，吾独不愧于心乎？”因痛自摧折，不数日死。其后子孙引以为鉴，逃于空山，夷然苍劲不拔之节，自秦至今千余年，竟无希势慕利者。<sup>[4]243-244</sup>

按照这里所喻，他当年出仕竟是被迫的，但心胸坦荡，并不为爵禄而去，即所谓“吾闻秦法暴，不拜惧不免。虽然，吾义不辱，吾姑受其官而辞其爵与禄焉。”他想象着松树后来自尽，而其子孙得全名节。其《五大夫辨》云：

世之称松者必曰大夫，其说盖始于秦始皇帝。帝东巡泰山，遇雨避松下，既去，以五大夫封之，今千余年矣，世未能辨其事者，故卒不易。予曰：是何其不能鉴松之节、明松之志而厚诬之以其名也！夫以秦之强，始皇之暴，官车四出，人怨神怒，天下无智者知其亡而不愿为之臣妾，而况泰山鲁地也，其山川草木，涵濡于周公、伯禽之泽。至于松者，生于徂徕，宗庙几筵之用，其志矫以洁，其不能遽辱以世俗之名可知也……而谓松者遂降志丧节，役于其名，且以号于人曰吾大夫也欤哉！（下以四皓、田横、李密、鲁仲连为例——引者）假使松而能言，当秦之封，安知不为横之死、密之辞、鲁连之弃去？而后世之士得其一节，遂谓横为汉之王侯，密为晋之洗马，仲连为受千金之赠，又岂理也哉！<sup>[4]245-246</sup>

该文对泰山松接受秦始皇敕封一事给予否定，认为后人只看到事情之一面，并不了解真相。以久浸儒家忠义之教的齐鲁之地的松树怎么可能接受暴秦的封号呢？因此认为泰山松接受封号是后人“何其不能鉴松之节、明松之志而厚诬之以其名也”！假如这一篇也是谢良琦内心的写照的话，那两篇合而读之，确实有点意味深长。所以我怀疑这是其晚年罢官下狱失意后的梦醒之言。若如其言，

①《醉白堂诗文集》文集卷1《许哉庵诗序》，第19-20页。前文已有考证，知谢氏随清军北上是在顺治五年，其出仕应该是顺治六年己丑（1649年），从清军北上第二年就出仕了，则是主动投入的可能性较大。

其出仕完全是为了内心的救世匡风理想，并不能表明是投降清廷，而毋宁说是投降于正义；人过中年以后，谢氏经历了一连串宦途挫折，丢官失禄，几至于死，他认为这是自己坚持正义与良知的结果，则从前的入仕之误与否，都可以一笔勾销。

### 三、结论和讨论

赵世瑜教授在论及明清之际的遗民陈确的忠节观时指出，陈确继承着传统的忠节气节观念，反对向新朝投降；另一方面，又对传统的忠节观有所叛逆，反对一死了之的殉节行为，这种比较矛盾的心态反映了明清之际思想界的整体面貌，其深层原因在于明中叶以来因社会经济关系变化而带来的社会思潮的变化。<sup>[10]</sup>谢良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时代思潮的影响，不过他的“半遗民”心态，其实并不在于反对新政权或不与之合作，而在出仕方面是比较积极的，但内心固守着一种不合时宜的精神，因为他们见过太多的谐臣媚子、骄兵悍将，以及士大夫依阿苟且之习，他们希望新朝是积极向上并一改积弊的。以谢良琦为例，当他看到新朝稳定局势消弭战乱、重开科考、尊崇忠孝节义，他就积极参与政事；而当晚年遭人构陷悲剧发生时，他明白新朝在很多积弊方面仍旧是旧朝的延续，于是失望以至于写出否定性的激愤之言。我们把这种心态放到桂林自明末以来的区域历史当中来解读，能有更甚的体会。而桂林士人这种执着的不合时宜理想，导致后来长期的压抑，如就中央任官或地方大员而言，直至乾隆朝出现大学士陈宏谋，几乎是没有人。

与全州不远的宝庆（今湖南邵阳），部分明代获得功名的士子同样不愿出仕新朝，但是支持其亲友儿孙辈入仕。如：王嗣翰在明清易鼎后，不愿出仕清朝，其子王元复后来成了著名士绅，为清初“楚南四家”之一，主讲濂溪书院；岁贡生简而廉和其长子简文灏入清后均不仕，但支持其次子简文瀚和简文灏出仕。<sup>[11]</sup>这样的选择在宝庆府是属于主流的。

将多数地处边疆的士绅对于出仕的选择置于时代具体环境之下考察，发现之所以如此，大致原因有以下几方面：其一，在经历了明末清初长达数十年的动荡之后，他们更多的是希望社会政治稳定，以期于获得安定的环境，然后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进

一步的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其二，清政府在康熙初年短短十数年间，进行蠲免钱粮、整顿赋税、恢复文教和科举、恢复秩序等措施，在百姓心目中已经是一个替代明朝天命的合法政权。在天命循环和因果报应特别流行的西南民族地区，人们更容易接受一个新政权以取代“气数已尽”的旧政权。当然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例子来证明。其三，处于国家边缘的士子，由于生存出路有限，更需要新政权接纳自己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其四，地处边陲的士子，接受儒家教育可能更为理想和纯粹，是否接受新朝并出仕，在于统治者是否依照儒家传统的施行仁政，符合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其五，清朝统治者也更需要边陲士子的号召力和示范作用以尽快建立自己的统治，完成秩序的重建，因此清初对于旧朝的投降者是容易接受并想方设法妥善安排的，不像乾隆以后对所谓明末变节大臣的谴责。总之，综合时代时势、地方文化传统和士子的个人利益选择，有这种集体选择是毫不奇怪的。

### 【参考文献】

- [1] 赵园.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2] 汪学群. 明代遗民思想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 [3] 梧金丽. 谢良琦研究 [D].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11.
- [4] 谢良琦. 醉白堂诗文集 [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2.
- [5] 李新益. 广西教育史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 [6] 嘉庆《全州志》[M]. 温之诚, 修. 曹文深, 纂.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19: 134.
- [7] 胡小安. “动乱”、制度与社会变迁: 明清以降桂林地区的族群问题研究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7.
- [8] 王思任. 王季重十种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7: 35.
- [9] 熊柱. 评湘中酒人 [M] // 谢良琦. 醉白堂诗文集.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2.
- [10] 赵世瑜. 试论陈确的忠节观 [J]. 史学月刊, 1998 (5): 76-91.
- [11] 光绪《邵阳县志》[M]. 李炳耀, 李大绪, 修.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5: 304.